

楊度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楊慶集

周谷城題



刘晴波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扬 度 集

刘晴波 主编
责任编辑：李沛诚
装帧设计：廖 铁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625,000 印张：27 印数：1——2,100

统一书号：11109-375 定价：6.60元

新书目：85—18

论 杨 度

——《杨度集》代序

刘晴波

杨度（1875—1931），是我国二十世纪初涌现的著名的政治人物。他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曾经起过不同的作用。因为他曾是“筹安会”六君子之首，人们对他又缺乏全面了解，因此，有人称他为帝制余孽，或者目之为投机善变。至于杨度的爱国主义思想，特别是从协助孙中山北伐到走上信仰共产主义道路的事实，大多晦而不彰。其实他是一位有救国抱负和富于才华的人物，是中国近代具有学人才质的政治活动家。他的诗文并茂，又治经史，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佛学等方面，有很多著作。然而，自一九三一年他逝世至今，尚无人收集整理和出版他的文集，这是令人遗憾的事。

在抗日战争之前，杨度的亲属曾经将其诗文整理成集，可惜稿件毁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长沙“文夕”大火。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重病住院期间，告知有关同志，要在辞书的有关词目中写明杨度晚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做了党所安排的工作，有一定贡献。这个史实一经公布，在史学界和人民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人们渴望了解杨度的历史情况及其思想演变。在这个时候，老友何汉文同志便以多年收集所得，撰成《杨度传》初稿，并由杜迈之同志协助核对，并作了补充，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解放后

第一部介绍和论述杨度的著作，为海内外读者所注意。而何汉文、杜迈之同志感到杨度的诗词遗存下来的已经很少，而散见于各方面的文章著作还有很多，“拟以将来另编《杨度集》（《杨度传·后记》）”。可惜近岁何、杜二同志相继逝世，未能实现“另编《杨度集》”的愿望，这是很为惋惜的。

为了满足史学研究的需要和读者的愿望，我们这几年收集资料，编辑了《杨度集》，约六十万字。虽然集子仍不够完整，但它包括了杨度青年至晚年各个时期的诗文、函电和论著，就目前条件而言，也算较为充实的一部杨度著述的汇编了。从中我们可以基本上窥见杨度走过的历史道路和他的政治思想的演变。就此，编者拟略为纪述分析，以就正于读者。

（一）

杨度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烈并交织在一起。面对这种现实，他在青年时期，就以爱国救世的姿态投入了政治斗争。在阶级斗争的风云变幻中，他有奋进，也有后退；有失败，也有胜利。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使他成为了一个颇为复杂的历史人物。

杨度，湖南湘潭人，原名承瓚，字皙子，后更名度。二十岁中举人，是著名学者王闿运的得意门生。一九〇二年和一九〇三年，两次赴日本留学。他为人热情活跃，交游广泛，其寓所有“湖南会馆”和“留日学生俱乐部”之称。一九〇五年七月，他与孙中山相晤，并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随后，他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又与梁启超过从密切，并为清五大臣考察宪政撰

写报告蓝本。接着创办《中国新报》，自任总撰述员，组织过政俗调查会，自任会长，积极鼓吹君主立宪。后来由于张之洞、袁世凯联名奏保，他便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宣传立宪，主张“开设民选议院”。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杨度成为袁世凯利用的重要棋子之一。他和汪精卫发起成立“国事共济会”，不久被袁世凯任命为学部副大臣。当南北议和时，他俨然以会外要员的身份积极斡旋。袁世凯以赞成共和为名而行攫取政权之实，杨为其四处奔走。当黄兴等邀约杨度参加国民党时，杨度又以“取消政党内阁”为条件，拒绝加入。以后，杨度被袁世凯任命为宪法委员会委员、参政院参政、国史馆副馆长等职务。一九一五年，杨度“承极峰（指袁世凯）之旨”，先撰《君宪救国论》，后组筹安会，大肆鼓吹帝制，为袁世凯称帝出谋划策，及袁帝制失败后死去，他作为“帝制祸首”被通缉。至此，杨度才基本上结束了为君主立宪而鼓吹奔走的政治生涯。

杨度避居天津、青岛后，潜心研究佛学。一九一七年五月，他曾派代表参与张勋召开的第四次徐州会议，对复辟帝制有所谋划。当张勋拥溥仪复辟时，他又发表“江电”加以反对。一九一八年九月底，他又在上海发出公电，陈述解决南北纷争的三项主张，放弃君主立宪的调头，对共和政体提出了具体建议，并向广州军政府和孙中山等表明了态度。“五四”运动以后，他和李大钊等进步人士交往。当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叛变后，他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往返于京、津、保、沪之间，出入于北洋军阀曹锟等人幕中，以纵横捭阖之术，为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努力。其间，他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的活动，积极营救被军阀逮捕的《京报》社长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

一九二七年，杨度曾尽力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李大钊。一九二八年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初移居上海，以上海帮会首领杜月笙的“清客”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参加了中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活动。一九三一年逝世，终年五十七岁。临终之前，他留下了批判自己错误、坚信美好将来的具有无产阶级革命者气概的自挽联：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二)

杨度经历的道路，他个人政治思想的变化，反映了我国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他十八岁至二十八岁期间，即从捐监生、中举人起，一直沿着封建士大夫的仕途迈进，“学剑学书相杂半”，又研讨经史，特别注意其师王闳运的“帝王之学”，留心古代策士之术，企图物色、辅佐“非常之人”，而成帝王之业。这是青年杨度一个重要的思想特征。

王闳运曾说杨度是“书痴自谓不痴”，近来也有人说他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典型形象”。其实，从青年时期起，杨度除了“书痴”这种表现之外，而“自谓不痴”确实是有根据的。一八九五年他二十一岁的时候，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他痛感丧权辱国，便随同湖南在京举人上书清廷，主张拒签《马关条约》，要求参加抗倭战争。他在“刺时”的《西山篇》诗中发出了“式遏尔室，以斥孔壬”的呼声，要求斥逐大奸佞臣，以挽救国家颓势。不久，又在江亭写下了“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阳衰草”的词句，以抒

发自己的悲愤之情。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他在赠夏寿田的诗中说：“岂伊拨乱志，空谷孰与宣？同车信莫从，击楫徒悠然”；又自表心迹地说：“问我东山高卧时，苍生扰乱应思起”。这些诗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杨度关心国事的意向。他开始思考对付列强的办法，并于一九〇二年三月向其师王闾运“问王霸之别及今日夷务应付之方”。王的回答使他“意不以为然”，只是碍于师道尊严，“而惮于驳难”。杨度在青年时代，虽经两次落第，而追求个人仕进的思想仍占有主导地位，但是祖国处在危亡之中，他忧时救国的思想却在日益滋长。

杨度救国思想的激扬和发展，是在两次赴日留学期间。他第一次在日本学习半年，目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的日趋强盛，又阅读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论著，在政治思想上有了明显的进步。此时，他除了读书之外，还发表了《支那教育问题》，《〈日本学制大纲〉后序》和《〈游学译编〉叙》等论文，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的进步活动。他和黄兴、杨笃生、樊锥、梁焕彝等筹组《游学译编》，领衔在上海呈请立案，在所撰《叙》文中，力主中国“乘此迎新去旧之时而善用老大与幼稚，则一变而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国”，表现了对中国美好未来的向往之情。

《支那教育问题》，是他在东京弘文学院结业时与其师嘉纳治五郎辩论的谈话汇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思想。嘉纳除了谈论教育和实业等问题以外，又涉及到许多尖锐的现实政治问题，杨度提出了质询并且当面进行辩论。在种族和满汉关系上，嘉纳维护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和满洲贵族集团的统治，倡言处此“种族竞争之世界”，黄种人“宜自相提携，岂可自相离贰？”主张“支那人种臣服于满洲人种之下而立国”。嘉纳的意图是汉族在教育方面，“必以臣服满洲人种为其要义”，并与日本等黄种人国家

“相依相爱，以与白种相敌”。杨度驳斥嘉纳的谬论，认为满洲人臣服列强和日本之下，而对汉族人民则“赏罚生杀，威风犹赫”，所以汉民族“则以为满洲臣仆之故，几为各国臣仆之臣仆，以奉满洲主人之故，几以各国为主人之主人”。处在这种被压迫地位的民族，“令其蜷伏于下而求接欢于上”，“以期共保黄种”，岂不是只有满洲统治者所“乐闻”？杨度“正告”嘉纳说，要求黄种“相爱相护相提携相联络”，前提条件是“以各成其独立，使同列于平等之地”，不可以“伸彼而抑此，主彼而奴此”。他坚持国家独立、民族平等的这种主张，对当时留学界是颇有影响的。

在中国政治改革问题上，嘉纳反对革命的武装斗争，主张“实行和平的进步主义”，而不能实行“骚动的进步主义”。杨度则力言急剧变革的骚动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当社会改革秩序未明，亦不能免于骚动，此可预知者也”。他进而认为，日本实行明治维新，近代欧洲经过“骚动一级”，才有“今日之进步”，可见“骚动者所以促文明之进步，而非阻文明之进步者也”。也只有如此，才能“鼓起全国之民气，使之破除陋习，发扬蹈厉，以言论思想之自由，促成社会改革一进千里之势。这种局势的出现，不能“谓之为流弊，即谓之为大利，亦无不可也”，然而清廷“专以防弊为主，此其所以弱也”。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与其“和平而不进步，不如骚动而进步也”，中国“此时于百亡之中而求一存，亦只有孤注一掷之谋”。由此可见，杨度当时是极力主张采取激进手段，进行政治革命的。

关于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保存国粹的关系，是清末政界、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嘉纳认为中国“向尊儒教，教育仍宜以儒教为宗。至于路索（卢梭）诸人之学说，不过有此一说而已”。杨度则反驳说，“学术上亦不能无所改革”，因为汉民族要

从长期“服从”的“恶根性”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非路索诸儒之说不能为力”，否则“仍泥旧学而不思变动”，则“名为精神之教育，实以重奴隶之性”。这样，“有末无本，虽教育数十年，亦与前此之办洋务何以异”？

杨度第一次留日期间，表现了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所具有的爱国反清的激情，所以当他回国以后向王闳运叙述自己在日本学习所得时，王听后斥责他“云欲抹杀君父，以求自立”，“然必期于流血，则又西洋好杀之习”，把杨度的思想视为“异端”。

杨度回国以后，曾在欢送湖南第二批赴日留学生宴会上发表演说，痛陈国家危亡的情势：自甲午至今日，未十年经三大变：甲午割台湾；戊戌割旅顺、大连、威海卫；庚子之变，立新约数百条。他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于前之瓜分主义，一变而为保全主义”，提醒人们注意：“中国之亡，甚于累卵”。他号召留日学生，“讲求科学，以新吾中国，救吾中国”，表现了意气风发的革命气概。

(三)

一九〇三年八月，杨度第二次到日本。这期间除了为争粤汉铁路废约自办短暂返国一次外，他在日本生活了四年。当时正是中国反清的民主革命力量发展壮大之时，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处在这种形势之下，杨度的政治思想开始起着变化。他结交了革命人士，与孙中山讨论过救国大计，又同黄兴等磋商反清革命。他怀着忧心国事的强烈感情，抒写了气势磅礴的《湖南少年歌》和《黄河》歌。《湖南少年歌》述说湖南美丽富饶的山川地理和爱国忧民的历史人物，斥责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也指出了湖南人民生离死别的惨状，并历数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罪行，

颂扬了湖南人民反抗压迫的顽强精神，号召人们起来救国，“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他认为在救国运动中湖南是中心，“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在《黄河》歌词中说：“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杨度的这种思想言论，不免流露一些传统的旧观念，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救国图强的精神，是鲜明而激励人心的。因此这两首歌词广泛流传，对当时许多青年特别是湖南青年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正因为杨度此时具有这种反帝爱国的思想，所以一九〇四年十月临时返沪时，便参加了华兴会的活动及其外围组织“爱国协会”，并于次年七月在孙、黄之间互为介绍，成为促进孙、黄合作的桥梁之一。

收回粤汉铁路主权，是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杨度第二次赴日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他为粤汉铁路废约自办呼号奔走，在留学生中发起成立“鄂湘粤铁路联合会”，并被推为留日学界总代表，随后回到上海参加收回路权运动。他在《粤汉铁路议》和一些函电中，指斥外资接办、华美合办是“卖国”行为，“每思此事，辄为愤恨”，因而力主废约，收回自办，表现了他反帝爱国的正义立场。

但是另一方面，杨度的思想也在起着变化。在“和平的进步主义”与“骚动的进步主义”之间，也就是在革命和改良之间，他开始动摇后退。其中一个关键的行动是一九〇六年初，清廷五大臣考察宪政经过东京时，杨度接受了代拟报告蓝本的任务，从此他向着以“立宪”为标帜的改良主义道路滑动，而且越陷越深。

在此之前，杨度和改良派人士有过一些联系，比如结交梁启超，曾向梁说：“国中青年子弟道德堕落，非有国粹保存之教育，

不足以挽狂流，如前次所面论者”，并说“匡吾过而救吾失者”，在众人之中“无如足下”。梁也引杨为同道。但是那时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野并不十分明显，争论只是初步的，杨度某种改良的政治态度还不十分鲜明。在同盟会成立和发刊《民报》以后，革命派与改良派展开了大论战。在这场带有政治思想解放运动性质的辩论前后，杨度的改良主义言行明显地有所发展。同盟会成立前夕，他不愿同孙中山在政治上合作。不久，在梁启超的协助下，完成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文，作为五大臣考察报告的蓝本。当一九〇六年九月一日清廷下诏“预备仿行宪政”的时候，革命派揭露这是“笼络人心”，阻碍“民族革命之潮流”，而杨度却开始谋求立宪的具体进程了。他和梁启超、蒋智由、徐佛苏等人筹组宪政党失败后，又与人组织“政俗调查会”，表示自己要独立结党而不依附于康、梁，并决定以“设立民选议院”为实行宪政的中心目标。接着，他因奔丧返湘，又与湘绅谭延闿等人组织宪政团体，发起入都请愿。

杨度在日本后一个阶段的思想观点，反映在《中国新报·叙》、《国会与旗人》等论文中，而在约十四万字的《金铁主义说》中尤为集中。他深感闭关自守被打破以后，“仰瞻遥天之风云，俯视大洋之波涛”，列强“处心积虑以图我”，“经济势力深入之后，而军队随之”，“使吾中国有亡国之实而无亡国之名”。因而他愤怒揭露：“所谓保全支那领土者，即不欲均分土地之谓也；所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者，即欲均分财产之谓也”，中国已成了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殖民地，清廷则是“对于内而为偷钱之政府，对于外而为送礼之政府”。杨度从国际斗争的角度观察问题，提出了“救时之计”，以图富民强国，表现了一个爱国者的政治热情。

杨度认识到经济战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的

“富民强国”方案也以此立论，创一新名词称之为“金铁主义”。他解释说，“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换句话说，“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这种“经济的军国主义”，对内采取“富民”政策，以“工商立国”，“扩张民权”，以“有自由人民”为目的，从而“以保存固有利权，以抵制外人之占领”，达到“使国中生产事业日趋发达，于经济战争之中，由劣败而返于优胜”；在对外方面，采取“强国”政策，“军事立国”，“巩固国权”，并且能“有责任政府”，以求“专以对外”，“全民皆兵，并力于外”，达到“立于世界”的目的。杨度为实行“金铁主义”，提出的救国措施也较前具体。在关于民主革命的问题上，他却坚持反对的立场，而在君主立宪的歧途上继续滑行。

如何处理满汉关系问题，这是当时革命派和改良派争论的焦点之一。杨度认为“满族实为中国领土上之人民，不过与汉族为同国异种之民耳”，因此，他主张“满汉平等，蒙回同化”。他认为以清代明，“是为朝姓之迁移，而与国家之存亡毫无关系”，汉族百姓不能误认为“亡国”。他这种见解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清朝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工具的时候，满洲贵族掌握的清朝政权，必然成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焦点。革命派提出“反满”（“排满”）的口号，确为中国民主革命之急务。然而杨度这时却有意无意掩盖这种尖锐矛盾，即认为“今日中国满汉问题不能及于皇室，但为人民与人民间之问题，而皇室立于满汉之外”，所以“君民之间，久无所谓满汉问题”，而且“至今日利害相关而尤甚”。显然，在观察满洲贵族与广大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时，他陷入了极大的政治错误之中。

由于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认识的错误，导致了他在以后的

政治斗争中走入更大的歧途。如果说他在一九〇六夏，所拟五大臣考察报告蓝本时还有代人捉刀之意的话，那么到一九〇七年初，他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上成为君主立宪的一个重要的鼓吹者和组织者之一了。杨度认为要“富民强国”，实现“经济战争国”，非作政治上的改革不可，这是顺应时势要求的。他在《金铁主义说》中阐述了改革的方略。但是，他的政治改革的目的，是将“不负责任之政府”，“改造（为）责任政府”，改造的方法则是“开国会”。他认为“以革命军改换君主，其事甚难，而所得又常不足以偿其所失；反之而以国会改换政府，其事甚易，而所改者必优于前者”，所以他说，“吾今日所主张之唯一救国方法以大声急呼号于天下者，曰‘开国会’三字而已”。总括起来，“吾之目的在开国会以改造（为）责任政府，而其方法则在立政党以谋开国会耳”。在杨度看来，只要有国会，有内阁负责，则“君主（立宪）亦可，民主（立宪）亦可”，并着重表明，“吾人所主张者为君主立宪政体”。这时从理论到实践，杨度已经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君主立宪派了。

人们也许要问：杨度从一个主张“骚动的进步主义”的激进革命者，演化为一个君主立宪派的中坚，其原因在哪里？我们认为：一、杨度确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而且提出了一定的救国措施，比如经济立国、军事立国政策以及收回路权矿权，关税自主，反对奴化教育等等；但他对国内的阶级矛盾缺乏正确认识，而又兼有封建士大夫气质，因而他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上持保留态度，也不赞成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纲。他期望相当程度的改革，希望通过君主立宪来达到目的，而不主张推倒现行的政府。当时的《复报》指出，杨度主持的《中国新报》只讥清廷为“不负责任”之政府，不究“不负责任之原因”，是“不求其本”。这正说明了杨度的反清，本来就是十分软弱的。

二、杨度深受“帝王之学”的影响，存在着比较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他在《湖南少年歌》中以华盛顿、诸葛亮自比，企求在个人成就上出人头地，或者辅佐“非常之人”以成显赫事业。他学习和接触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思想后虽有所得，但究竟比较肤浅，没有能够放下封建思想的负担，所以在政治斗争中，他的资产阶级新思想和封建主义旧意识之间，“骚动”手段与“和平方法”之间，在不同时期表现了此起彼落的交错现象。他在第二次留日期间的政治主张与社会活动证明了这一点。他交往并支持过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但又不加入其组织；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立场有距离，但又在改良的政治主张上大同小异。因此在这两种思想和两类救国方法的矛盾斗争中，一旦与个人的成就与事业联系在一起时，他就偏重于个人目的的一面，甚至不惜“为满洲辩护”。三，在这几年中，杨度目睹了清廷镇压革命党人的“苏报案”，他感到恐惧，怀疑革命手段是否能取得胜利，后来他称革命党人“暴烈有余，成事不足”，这不是偶然的。当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杨度即认为发挥“帝王之学”的机会到来了，便欣然接受草拟报告蓝本的任务。这时，杨度的旧意识占了上风，“和平方法”占了主导地位，稳步走上了改良主义道路，揭开了他的一场政治悲剧的序幕。

(四)

如果说杨度的君主立宪理论和实践活动，在日本期间还带有民间性质的话，那么到了清廷宪政编查馆任职和后来组织筹安会的时期，他就一跃而为清廷和袁世凯的附庸了。虽然这时他的救国设想和清廷、袁世凯的政治目的还有些差异，但在总的方向上

却是一致的，而同革命派则更是背道而驰了。特别是袁世凯当权以后，杨度已从在“宪”不在“主”，变成了在“主”不在“宪”了。他的言论与行动，坚决维护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利益，同时也维护他自己和某些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利益。杨度本人于一九〇八年春加入湖南华昌炼矿公司，占有比重很大的股本，又有官方职务和薪俸，他便成为了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及其参政者改良主义的代言人。他在筹安会的活动，更表明他早已成为袁世凯的重要谋士。他追求个人权势，达到了一个高峰。

在这个时期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武昌起义后，杨度受袁世凯的指派，在南北议和中进行活动。这时他一改君主立宪立场，忽而变为赞成共和。时人斥责他为“向主君主立宪，不应忽主共和”，近来台湾也有人说他是“投机”。其实这都不是本质问题。他之所以赞成共和，主要是拥戴袁世凯执政，以便施展自己的纵横捭阖之才，达到实现个人权势的目的，这才是问题本质所在。

袁世凯帝制失败死后，提出了惩办帝制祸首问题，首列杨度其名。杨度确是帝制活动的积极鼓吹者和联络者，应当受到谴责，这是毫无疑义的。但真正应该受到历史鞭挞的是凶险的反动势力，它包括前清宗室、北洋军人和帝国主义，而以袁世凯为其总代表。杨度当时认不清这个问题的根源和本质，自愿“负首责”，“不委过于人”，北洋政府更多方掩盖事件的阶级本质，庇护执政大员，因此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个“祸首”问题。继袁世凯帝制之后，又出现张勋复辟和连年的军阀混战，这是必然的。只有到了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人民才明确了祸首是“列强和军阀”反动势力，而不是杨度个人。

(五)

杨度在受到通缉和后来被特赦以后，特别是在张勋复辟幻灭以后，对君主立宪主张绝望，便声称“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选择了遁入空门这一途径。这一时期，从表面上看，他确实在学佛，并写了许多论佛的文章，但他毕竟是一个爱国者，在君宪救国方案破产以后，仍在进行思考，探索新的道路，而且也没有停止政治活动，所以从本质上看，他的学佛论佛不过是不得已的酬世姿态而已。他的学佛论佛，成了他思想上的一个冷却净化过程，因而在佛学的理论方面，就糅杂着自己的切身感受，并赋予佛学以某些新义。

他的佛学著作收入《虎禅师论佛杂文》及续编，其中一九二八年的《新佛教论答梅光羲君》为其代表作，是他学佛的思想总结。

杨度在佛教各派中，近于禅宗南宗，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理论，演化为他自己的“无我主义”，反对地狱、灵魂、轮回、坐禅、戒律等说法，主张解放僧尼，也批驳了老、庄、儒、墨等家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不合乎“无我主义”的各派学说。他认为“中外古今各家学说，无一足称无我主义”，因而不能解决“社会之不自由、不平等”问题。他的“无我论”，“即心理相对论”。“此论之旨，在明心理相对，即为本心无我，一切皆空”。据他自己说，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境界，经过了“四不法门”（即“不离身以求心”、“不着身以求心”，“不积极以求心”，“不消极以求心体”）的探索过程。杨度的“新佛教论”，尽管以“佛教革命”自任，其本质上仍是禅宗南宗一派的主观唯心主义。但是，在他学佛论佛之中，也有几点值得注意。